

學習“蘇聯建成社會主義 的道路”第三、四章參考材料

遼寧人民出版社

321.3
875

學習“蘇聯建成社會主義
的道路”第三、四章參考材料

☆

遼寧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瀋陽市馬路旁）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239·787×1092 1/32·1頁印張·40,000字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091 定價：一角二分

PDF

目 錄

蘇聯共產黨怎樣領導實現農業全盤集體化的鬥爭 ……	理 夫 (1)
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基本方針 ……	魏 徵 (10)
技術改造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意義 ……	塞 風 彭錫祐 (18)
蘇聯共產黨爲在組織上、經濟上鞏固 集體農莊制度而鬥爭 ……	曾紫霞 (27)
蘇維埃憲法——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 民主勝利的總結 ……	王向明 (33)

蘇聯共產黨怎樣領導實現

農業全盤集體化的鬥爭

理 夫

一 實現全盤集體化的條件

蘇聯到一九二七年，由於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展，已使私有的個體農民經濟與全民所有的社會主義工業處於極不相稱的地位。當時工業是按照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法則向前發展的，而小農經濟有時連簡單再生產都很難維持。工業和農業的這種跛腳現象，集中地表現為糧食的生產遠遠落後於工業迅速發展的需要。如果不解決糧食方面的危機，不克服農業的落後狀況，工業化事業就無法實現，工業和農業間的結合就會瓦解，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工農聯盟也就會動搖。

由上看來，小農經濟的生產關係已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改造小農經濟已成為經濟上政治上的需要。因此，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盡量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方針。

蘇聯共產黨還在十月革命時，就已預見到農業集體化的必要性。但是，要從生產關係和生產技術兩個方面改造小農經濟，把千百萬個體農民引上社會主義道路，建立起集體農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任務，需要很多前提條件。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共產黨就開始了這一準備工作。直到一九二九年底，經過十二年的時間，前提條件才完全成熟。

首先是，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結果，使國家能夠供給農業以大批的拖拉機以及其他的農業機器。

其次，在恢復國民經濟時期開始之後，蘇聯共產黨在農村中廣泛建立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社，例如：消費合作社、信貸合作社、機器合作社（技術協作社）、推銷各種產品的專業合作社（乳酪、亞麻、菸草等），在對農民進行集體主義教育上起了很大作用，使農民逐步認識到了參加合作組織的好處。作為

向集體農莊過渡的橋梁的預購合同制，在這一時期也廣泛地建立起來。屬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共耕社也在大量地發展着。這就是無論從農業外部、從商品流轉方面以及從農業內部、從生產方面都在加強着社會主義陣地。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已經大大提高。

第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間，在糧食採辦運動中進行的反對富農的鬥爭已經使富農完全孤立，貧農和中農緊密地團結在工人階級周圍，這就給實現全盤集體化，消滅富農階級準備了力量。

第四，過去已經存在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已經提供了很多經驗，並且對農民起了典型示範作用。

此外，國家已經能够拿出款子在經濟上幫助建設集體農莊。

土地國有化也給實現農業的全盤集體化創造了有利的前提。

一九二九年末，農民的大批加入集體農莊運動就是全盤集體化條件成熟的標誌。

二 蘇聯共產黨實現全盤集體化的政策

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

全盤集體化就是對農村資本主義成分展開進攻，就是消滅富農階級，在農村建立新的公共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實行全盤集體化就需要把全村所有一切土地轉交給集體農莊。但當時有很大一部分土地還操在富農手中，因此農民便要把富農從土地上趕走，把富農的財產、耕畜、機器奪取過來。而富農當時爲了阻撓集體農莊運動，也採取了激烈的破壞活動，殺害集體農民和幹部，焚燒集體農莊的房屋和財產。所以農民就要求逮捕和驅逐富農。因此，「過渡到全盤集體化的經過並不是表現於基本農民羣衆簡單而和平加入集體農莊，而是表現於農民羣衆同富農進行鬥爭。」^①集體農莊既然是在與資本主義作生死鬥爭中建立起來的，消滅富農階級就成爲實現全盤集體化事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是偉大的革命轉變，只有當條件成熟時才能實現。因此，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到一九二九年羣衆性集體農莊運動開始

①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九五三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三七三頁。

前，蘇聯共產黨一直採取限制和排擠富農剝削的政策。就是說：還不是剝奪富農的財產，推翻其經濟基礎，還不是消滅富農階級，而是在允許富農存在的條件下，通過發展農村合作事業、對富農徵收高額賦稅、強制富農按照國家規定的價格把糧食賣給國家、實行租地法、僱傭勞動法等等措施，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對農民的剝削，限制富農經濟實力的增長，並為實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準備一定的條件。

為什麼不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像消滅地主階級一樣來消滅富農階級呢？因為消滅富農階級是與全盤集體化聯系在一起的，在全盤集體化條件未成熟以前就對富農採取冒然行動，不但是無益而且是有害的。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說：「你們儘可逮捕和流放幾萬或幾十萬富農分子，但你們若不同時極力設法加速建設新式經濟，用新式經濟代替舊式即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破壞和消滅鄉村資本主義成分在經濟上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產根源，那末富農終究還是會復活和增長起來的。」①也就是說，只要農民的小商品經濟還存在一天，也就不會有徹底消滅富農所必需的經濟基礎，因為滋長富農分子的基地還存在；只有全盤集體化才能提供為消滅富農階級所必需的經濟基礎。由此看來，消滅富農階級，只有在集體農莊運動提高到全盤集體化水平時才能實現。

斯大林說，在一九二九年前所以不能去消滅富農階級，是「因為當時我們在農村中還沒有可據以向富農實行堅決進攻的支撐點，即密佈於全國各地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可能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底社會主義生產去代替富農底資本主義生產。」②例如：在一九二七年富農生產的糧食還在六億普特以上，其中商品糧食約有一億三千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只生產八千萬普特，其中商品糧食約有三千五百萬普特，在這樣經濟力量與階級力量對比的條件下，要想消滅富農當然就是冒險而有害的行動。到一九二九年，由於羣衆性集體農莊運動的開展，情況就完全變了樣，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提供的商品糧食達到一億三千萬普特以上。到一九三〇年已經是四億普特了。這個變化說明，富農已經完全被孤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完全可以代替富農

①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七一頁。

② 斯大林：「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頁。

的資本主義生產，蘇維埃國家已具有充足力量消滅富農階級。由此看來，消滅富農階級，只有當全國經濟方面階級力量對比的變更完全有利於自己時才能實現。

蘇聯共產黨對富農政策的轉變，有力地推動了全盤集體化事業的開展。

當時蘇聯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形式

集體農莊的發展有其本身的規律性，表現在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有着不同的形式，這些形式的變更決定於兩個基本因素：一個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另一個就是農民的覺悟水平。隨着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農民覺悟水平的不斷提高，集體農莊的形式也就會由低級向高級過渡。

在蘇聯集體農莊運動中有三種形式。一、共耕社，這是集體農莊運動的低級形式，是在勞動農民生產結合的第一個階段上產生的，存在於全盤集體化未開展以前的時期。由於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覺悟程度的限制，公有化的範圍還是很窄小的，僅僅是把入社農民的一部分土地聯合起來共同耕種和使用，此外就是由集體勞動的積累所購買的一部分農業機器和興建起來的建築物，而社員本身的生產資料雖然也由社內使用，但所有權仍歸本人。其公共經濟收入的分配原則，是以社員所花費的勞動和供給社內使用的生產資料的價值為標準。二、農業勞動組合，這種形式不但把勞動和土地使用權公共化了，而且也把生產資料如耕畜、機器、農具以及其他經濟建築物公共化了。至於住宅、家禽、小牲畜、乳畜仍為集體農民的個人財產，並允許個人經營。住宅周圍的小塊菜園或果園也由農戶自己使用。在勞動組合中公共經濟是基本的，莊員的勞動幾乎全部耗費在公共經濟上。這種形式的分配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取酬」，也就是按每個莊員的勞動數量與質量來分配勞動成果。公共經濟是莊員收入的主要來源。三、農業公社，它的特點就是把所有一切生產資料都公共化了。公社經濟是建立在高度發展的技術基礎上的，它能保證有大量豐富的生產品，如穀物、牲畜、家禽、蔬菜等等，而且集體農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公用設施如機械洗衣坊、新式廚房、食堂、麪包廠等等也會得到廣泛的發展。因此農業公社的公共經濟是滿足集體農民需要的唯一和豐富的源泉，作為補助集體農民收入的個人副業，在這裏再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分配達到公共化。根據三種形式的特點，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基本區別，就是生產資料公共化的程度和收益的分配方法有所不同。這就完全反映了集體農莊運動從低級到高級的發

展過程。

蘇聯共產黨中央從決定集體農莊形式的兩個基本因素即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覺悟水平出發，並根據集體農莊運動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規律，在當時全盤集體化條件成熟的情況下，認為共耕社已成為過時的形式，如果再拘泥於這種形式就是停步不前，就是倒退；但要跳過農業勞動組合而逕直奔向將來才能實現的農業公社則是冒進，因為農業公社必須建立在技術極發達和產品極豐富的基礎上，而當時蘇聯的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還沒有達到這樣高的程度，還不能保證集體農莊的公有經濟滿足莊員的全部生活需要。只有農業勞動組合才是當時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形式。採取農業勞動組合的形式，可以把農民的個人利益和國家的公共利益恰當地結合起來，並使農民的個人利益服從於國家的公共利益。農業勞動組合允許農民擁有一小部分私人經濟，這不但可以滿足集體農民的個人需要，而且也照顧了不久以前還是個體農民的集體農民所必然存在的小私有心理和個體經營習慣。同時，農業勞動組合模範章程規定，集體農莊必須盡量發展公共經濟，嚴密保護社會主義財產和儘先履行對國家的一切義務，這就使得國家可以通過集體農莊的生產來滿足工業和人民的需要，可以在農村中建立鞏固的社會主義基礎。所以，黨中央確定農業勞動組合為當前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形式和基本環節，是有充足根據的。及時而正確地選擇集體農莊的組織形式是實現全盤集體化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說：「我們黨政治戰略底最大長處之一，就是它善於在每一個時機中選出整個運動底基本環節，抓住這個環節，便能把整個鏈條拖向一個總目標去解決任務。」①在集體農莊運動中誰要脫離農業勞動組合這個基本環節，誰就要犯錯誤，就會給全盤集體化事業帶來損失。

集體化的速度與自願原則

集體化的速度就是實現全盤集體化的期限，自願原則就是領導集體農莊運動的方法，這些都是蘇聯共產黨的集體化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為了羣衆的利益、依靠羣衆的力量是黨制定政策和實現政策的鐵則。而要做到依靠羣衆就必須善於啓發、教育羣衆，使羣衆根據切身的經驗相信黨的政策正確，根據羣衆的覺悟水平決定黨的行動步驟，既不能落在羣衆的覺悟後面，也不能跑得太

① 斯大林：「勝利衝昏頭腦」，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六頁。

前，否則就會脫離羣衆或失掉與羣衆的聯系。蘇聯共產黨中央在確定全盤集體化的速度時充分估計到全國各個地區的不同條件，首先是農民覺悟水平的差異，指明決不能千篇一律按着同一速度實現全盤集體化，而是要因地制宜。

蘇聯共產黨中央爲了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則逐步開展集體化運動，防止人工地加快集體化速度，就根據各地不同的條件把全國分成三類地區，規定了三種不同的集體化速度。凡是具有下列條件者則屬於先進區：一、物質條件，有較多已經鞏固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有較多的拖拉機；二、羣衆條件，即廣大農民羣衆已經確信新的經濟組織和新的技術的偉大力量和意義；三、領導條件，已有較多的具有領導能力的幹部。在這類地區（如北高加索區、伏爾加河中游和下游地區），要在一年左右完成集體化。條件稍差者則屬中等區，要在兩年左右完成。條件最差者則屬落後區，可在三年內即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大體上完成。

自願原則與因地制宜的原則有密不可分聯系。只有根據自願原則才能吸引農民羣衆參加集體農莊，這是列寧所一再強調過的。用強制命令的方法對待農民尤其是中農，迫使他們參加集體農莊，這是忽視農民覺悟水平的過火行爲。而任何違反自願原則的現象都會損害集體化事業，都會導致工農聯盟的破壞，造成中農對工人階級國家的不滿，結果也就會是便利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斯大林說：「現今集體農莊運動底基礎是工人階級與貧農聯合中農去反對一般資本主義分子，特別是反對富農。」①這就是說，從第八次代表大會一直到全盤集體化開始時，蘇聯共產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線仍然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堅決向富農作鬥爭。尤其是要搞好與中農的合作。爲什麼這裏特別強調與中農的關係呢？因爲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很多貧農上升爲中農，中農已成爲農村中的中心人物，如果工人階級不在依靠貧農的基礎上很好地去聯合人數衆多的中農，全盤集體化事業就無法實現。再說，由於中農本身所處的經濟地位，就決定他們對參加集體農莊顧慮較多，在沒有認識到集體化好處的時候，他們總是要等待觀望，這樣就容易在中農身上施用強制的方法。因此需要特別強調貫徹自願原則的重要意義。

三 爲反對在集體農莊運動中歪曲黨的政策行爲而鬥爭

全盤集體化運動蓬勃地開展起來了。到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日，全蘇聯已

① 斯大林：「給集體農莊工作同志們的答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頁。

有百分之五十的農戶參加了集體農莊。

但是，隨着集體農莊建設浪潮的到來，有些地區的工作人員、領導幹部很快地就暴露出極其嚴重的缺點和錯誤，他們公然違背了蘇聯共產黨中央關於集體農莊運動的政策。首先，違背了在集體化速度和期限方面因地制宜的原則，錯誤地提出「落後區趕上和超過先進區」的冒險口號，在「最短期內」結束集體化。有的地區在不多幾天內由百分之十達到百分之九十。他們好大喜功，盲目追求集體化的高度的百分數，根本忘記了各個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情況。其次，違背了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形式是農業勞動組合的原則，而逕直組織農業公社。他們好高騖遠，錯誤地提出「一切公共化」的口號，結果不但把一些農民的家畜公共化，而且把他們的家禽也全部趕走。秩序完全紊亂了，農民們到處吵吵嚷嚷。這種過火行為完全忘記了農民的覺悟水平和客觀可能性。最後，他們既然違背了集體化的期限和當前階段的主要形式，當然也就違背了蘇聯共產黨中央所規定的自願原則，而以強暴的命令方法和威脅的手段迫使中農參加集體農莊，結果有時候部分中農甚至部分貧農也歸入「被剝奪財產者」之列，而且在某些區域裏，「被剝奪財產者」竟達到百分之十五，被剝奪選舉權者則達到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他們完全忘記了聯合中農的重要意義。

這種「左」傾冒險主義的過火行為，便利了富農的破壞活動。這些階級敵人乘機利用農民的不滿情緒大肆煽動，唆使農民宰殺牲畜，造成大吃大喝的現象。甚至有些思想落後的中農在他們的欺騙引誘之下，幾乎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蘇聯共產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同樣利用這一機會向黨和國家進攻，污蔑黨和國家的集體化政策。總之，急躁冒進的結果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助長了敵人的兇殘。

值得嚴重注意的是這些貪多冒進、好高騖遠的過火行動，在很多地區是當時暗藏在蘇維埃政權內部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有意識地進行的。例如，北高加索邊區委員會第一書記舍伯里達也夫就是老牌的托洛茨基分子，德國的間諜，第二書記也是德國間諜。

於是，擺在蘇聯共產黨面前的迫切問題，就是對歪曲黨政策的行為展開無情的鬥爭，糾正偏向，使運動轉入正軌。為此，蘇聯共產黨中央通過決議先後公佈了斯大林的兩篇重要論文：「勝利衝昏頭腦」和「給集體農莊工作同志們的答覆」。在這兩篇文件發表之後，蘇聯共產黨內外的階級敵人就原形畢露了。證明蘇聯共產黨中央的政策與粗暴的過火行為沒有任何聯繫，相反的，黨

的政策被歪曲被糟蹋了。

斯大林在這兩篇文件中不但指出了在集體農莊建設中所犯的主要錯誤，而且指出了產生錯誤的根源和糾正錯誤的辦法。在農民方面所犯的根本錯誤，就是混淆了敵友界限，對中農採取了強力。他們忘記了與中農的經濟結合不能依靠強制手段，而是依靠於與中農協定和工農聯盟的。產生錯誤的原因就是被已經取得的成就衝昏了人們的頭腦，因而產生了「一切都不在乎」的誇大心理，這樣就使他們失去了冷靜的頭腦和明智的眼光，失去了權衡輕重的能力。暗藏在地方黨組織內部的階級敵人也就利用了一般工作人員的「左」傾情緒作了歪曲黨路綫的勾當。因此，必須消滅這種情緒，糾正當時所存在的偏向。

如何克服當時的錯誤呢？最主要的辦法就是回到黨的正確的路綫上來。用自我批評的精神，承認錯誤，挽回對羣衆的不良影響。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公佈了「關於反對歪曲黨的集體農莊運動路綫」的決議。決議中指出，立刻停止錯誤的過火行動，並責成各地黨組織檢查被剝奪財產、選舉權者的名單，糾正在這方面的錯誤，如果有些同志犯了錯誤而不糾正，要立即給予撤職的處分，由稱職者來代替。根據這一決議，蘇聯共產黨中央改組了一些不善於改正錯誤的省委和邊區黨委的領導成分。

施行這一系列的措施之後，迅速及時地糾正了偏向，提高了蘇聯共產黨的威信，徹底粉碎了階級敵人挑撥離間的伎倆，鞏固了黨與羣衆的聯系，集體農莊運動勝利地前進了。到一九三二年，全盤集體化事業已經基本上完成了。

四 學習蘇聯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歷史經驗

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經驗對我國有重大的意義。目前我國正在逐步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因此，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歷史經驗對我們會有很大的啓示和幫助。首先，蘇聯的經驗表明，在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時必須堅持自願原則，禁止任何強迫命令行爲。這條經驗對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農業合作化事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無數事實證明採取強迫命令的辦法來對付農民，必然使合作運動招致損失。在我國目前農業合作化運動迅速發展的情況下，保持清醒頭腦，堅持農民自願的原則，使合作化運動在正確的軌道上順利前進，顯得特別重要。其次，蘇聯的經驗表明，只有根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農民的覺悟水平，才能正確選擇運動的基本環節。這條經驗對我們也十分重要。從我

國具體情況出發，一方面，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進行的，農民對土地有嚴重的依戀心理，他們的覺悟還不高，另一方面，我國的工業很落後，還不能製造拖拉機和其他現代化的農業機器。這樣就決定現階段合作化運動的中心環節，是以土地入股和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條件未成熟以前，決不能盲目地向高級社即完全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過渡，決不能跳過運動尚未終結的形式。否則，就會傷害農民的利益，就會削弱工農聯盟，對整個社會主義改造事業都是不利的。再次，蘇聯的經驗表明，在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時，必須注意各個地區的特殊條件，這條經驗也是完全適用於我國的。我國是一個大國，自然條件，政治、經濟條件，組織條件，發展歷史，各地都不同，甚至差別很大。因此領導合作化運動一定要照顧到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特點，正確地確定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的快慢，組和社的各種制度，不能作硬性規定，不能公式化。

不過我們需要注意，在學習蘇聯經驗時，要具體分析中國情況，不能機械套用。首先，由於我國當前富農經濟的特點，對富農階級的消滅可以不採取一次較短時期的羣衆運動來實現，這點與蘇聯當時的情況就有很大的不同。其次，蘇聯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的農業改造運動是集體化和機械化同時並進的，而我國由於工業化程度太低，目前自己還不能製造拖拉機，農民對土地的私有觀念較重以及幹部不足等等原因，我們首先是要通過由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逐步轉到集體農莊的辦法把個體農民組織起來，再實現大規模的機械化。儘管如此，但吸收蘇聯在全盤集體化中的經驗教訓，對於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仍有着極重要的意義。

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基本方針

魏 微

蘇聯農業集體化方針的提出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根據斯大林的報告，通過了關於盡量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這次大會還擬定了擴大與鞏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網的計劃，對怎樣為農業集體化而進行鬥爭給予了明確的指示，並下了指令：繼續對富農展開進攻，採取種種新辦法來限制農村資本主義成分的發展，引導農民經濟循着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

蘇聯共產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是農業集體化的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以後的數年中，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蘇聯農村中展開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鬥爭。

為什麼這時候農業集體化成了迫切的實際任務呢？

這是因為當時農業發展的速度極為遲緩，它遠遠落後於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到一九二七年末，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已經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增到百分之四十二，達到了戰前的水平。大工業發展的速度尤為迅速。在一九二七年已經超過上一年的百分之十八。社會主義大工業的高漲，使蘇聯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日趨消滅，社會主義成分得到鞏固，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在蘇聯的所有工業中，私人資本主義部分不過佔百分之十四。這就是說，在工業方面，「誰戰勝誰」的問題已能預決要由社會主義獲得勝利了。但在此時，農業經濟的發展速度却異常遲緩，它與工業發展速度遠不相稱。自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的四年內，工業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而農業則僅增加了百分之二點六。糧食出產總量僅及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而商品糧食只等於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七，而且有繼續降低的傾向。這是非常嚴重的。

為什麼當時農業發展的速度比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速度緩慢呢？其原因一方面是出於當時農業技術還很落後，農村文化水平太低。更主要的還在另一方

面，就是由於散漫的農業生產，不像國有化的聯合經營的大工業那樣有種種優勢：它不是按照計劃經營，而是絕大部分還被小生產自發勢力支配着的；它還沒有按集體化的原則聯合成為巨大的集體經濟，因而它還是一種使富農分子便於進行剝削的場所。

商品糧食的減少，使當時的糧食供應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困難。大工業在日益增長，工人的數量日益增加，城市也在增長着。同時，隨着工業的發展，各種技術作物出產地區也在增加。所有這些情形，就使商品糧食需要額迅速增長起來。而當時蘇聯商品糧食產量的增長速度與糧食需要額增長速度比較起來，却顯得異常緩慢。

商品糧食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十月革命後蘇聯的農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主經濟消滅了，富農經濟減到三分之一，在農村中佔統治地位的是小農經濟，而且這樣的小經濟單位又在繼續分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俄國共有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個體農戶，到了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一九二七年），已經增加為二千四百萬戶至二千五百萬戶。當時糧食的主要來源是靠貧農和中農的小農經濟。農民收穫了糧食首先要留給自己消費，能夠作為商品出售的部分非常低微。當時小農經濟所提供的商品糧食只等於它的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一左右。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是可以拿出最多的商品糧食的（佔它們糧食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七左右），但當時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數目還很少，一九二七年，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所出的商品糧食，僅佔商品糧食總數的百分之六。這種情形，就使商品糧食比戰前急遽地減少了。戰前，商品糧食是十三億零六十萬普特，現在減至六億三千萬普特了。

農業的落後，給整個國民經濟造成了一種危險的局勢。

要解決這個問題，非改變生產方式不可，依靠小農經濟是不能解決這個困難的。因為現代社會的發展條件，是在於逐年的擴大再生產與逐年的積累。但當時蘇聯的國民經濟能夠按照擴大再生產的原則來發展的，只有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這個社會主義工業逐年擴大，逐年增加積累，保證着工業迅速向前發展。而當時佔優勢的小農經濟，大部分不僅不能逐年實現擴大的再生產，甚至連單純的再生產也不是時時都有可能實現的。斯大林尖銳地指出：「是否可能在一個較為長久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築於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即建築於最巨大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散漫落後的小商品農民經濟基礎上呢？當然是不可能的。長此以往，全部國民經濟都會有完全瓦

解的一日。〕①

那麼，出路究竟在哪裏呢？

要使農業能够實行積累，能够實現擴大再生產，就必須把它變成巨大的農業。斯大林指出，要作到這一點，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即是在農村中扶植大的富農農場經濟，這不僅費時很久，而且會使廣大農民羣衆陷於貧窮和破產的境地。顯而易見，這條道路是和現存的社會主義經濟絕對不相容的。另一條就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即是把小農聯合起來成為使用技術和最新科學成就的巨大的集體農莊，把資本主義分子從農業中排擠出去。

蘇聯人民的公敵——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站在叛賣性的立場上，竟然否認以合作化方式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他們企圖把農民推回到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上去。

斯大林粉碎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恢復資本主義的企圖，並正確地指出：

出路就在於用公共耕種制做基礎來把零散的小農莊聯合為大農莊，用新的更高的技術做基礎來實行集體耕種制。

出路就在於循序漸進，然而一貫到底地，不是用強迫方法，而是用表彰和說服方法，把小的和極小的農莊聯合為大的農莊，以公共的共耕式的集體的耕種制做基礎，同時採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採用增加農業強度的科學方法。

別的出路是沒有的。②

斯大林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這個方針，受到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一致擁護，大會的決議規定：「在現在這個時期中，應該把聯合和改造小農個體經濟為大的集體經濟，作為黨在鄉村中的基本任務。」③

① 斯大林：「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五頁。

②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三頁。

③ 「聯共（布）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聯共（布）決議彙編」第二輯，一九五三年俄文版，第三五五頁。

實現農業集體化是鞏固工農聯盟、 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道路

實現農業集體化，不僅對於消滅農業經濟的落後性和解決糧食供應困難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爲了把農業經濟改造成爲新的社會主義根據地，也是十分必要的。

小農經濟是成長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面的。小農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同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爲基礎的。當小農經濟還佔優勢的時候，資本主義就有復活的可能。正如列寧所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①列寧教導我們，要消除這一危險，就必須把全部社會經濟加以組織上的改造，使個體的單獨的小商品經濟過渡到集體的大經濟。

斯大林發展了列寧的關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他說：

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是把農業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爲一個整體經濟，使農業服從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在農產品和工業品交換的基礎上調整城鄉關係，堵死和消滅階級首先是資本藉以產生的一切孔道，最後造成直接消滅階級的生產條件和分配條件。^②

把千百萬分散的農民轉移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是一種非常困難的事。要實現這個艱鉅而複雜的任務，必須依靠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採取農業集體化的方針，對工農聯盟將會發生什麼影響呢？斯大林指出，「這些辦法只會促進工農聯盟鞏固的事業」^③。

爲什麼農業集體化能促進工農聯盟的鞏固呢？因爲在國民經濟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工人階級和農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農業如果不實行集體

①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九二頁。

② 「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一——二二頁。

③ 斯大林：「在糧食戰綫上」，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五頁。

化，不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聽任自流，它就必然要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農民羣衆必然要遭受城鄉資產階級的剝削，而陷於貧窮和破產。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是要消滅農村中的剝削，使農民羣衆免於貧困，相反地還必然會提高農民羣衆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因此，農業集體化可以更加鞏固工農聯盟，使工農聯盟獲得一個新的經濟基礎。

蘇聯在實行全盤集體化以前，中農是農業中的主要人物。而中農是具有二重性的。一方面，他們是勞動者，這個情況，使得他們傾向於社會主義。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小私有者，在這一點上，他們又傾向於資本主義。中農的這種二重性，就使他們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搖擺不定了。

當時階級鬥爭的形勢是非常尖銳的：或者是工人階級領導基本農民羣衆，引導他們來建設社會主義；或者是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分子把中農拉過去而給蘇維埃政權以致命的威脅。

爲了爭取中農到社會主義方面來，按照列寧的著名的口號，就是：依靠貧農，與中農結成堅固聯盟，一分鐘也不停止反對富農的鬥爭。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工人階級和全體農民的聯盟，而是工人階級和農民勞動羣衆的聯盟。這種聯盟的鮮明的性質，是和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分子富農作鬥爭。這種聯盟，不把貧農當作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組織起來，是不能獲得鞏固的。

蘇聯人民的公敵——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企圖破壞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聯盟。托洛茨基分子否認工人階級和中農有結成聯盟的可能性，說農民是一種反動力量，說工人階級和農民必然會發生「無法解決的衝突」。布哈林分子則主張不要去觸動富農，讓他們有自由發展的機會，布哈林分子居然贊成和包括富農在內的全體農民聯盟。

斯大林揭穿了這些反革命者的陰謀，捍衛並發揮了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聯盟的原則，他說：

列寧主義絕對主張與農民基本羣衆堅固聯盟，主張與中農聯盟，但它不是主張隨便一種聯盟，而是主張能保證工人階級領導作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便利於消滅階級的與中農的這種聯盟。①

① 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頁。